

A BIOGRAPHY OF JIANG JIESHI

刘 红◎著

蒋介石全传

4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左右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
长期以来，世人对蒋介石的历史评价褒贬不一，
本书力求对蒋介石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团结出版社

A BIOGRAPHY OF JIANG JIESHI

刘 红◎著

蒋全

介传

石

4





蔣介石全傳

· Biography of Jiang Jieshi

台北与蔣介石的晚年

1949年12月7日，在正在逼近的人民解放军进攻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的专机从成都双流机场仓促起飞，从此他永远离开了大陆；“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被推翻，台湾地区成为国民党当局新的栖息地，刚过63岁生日不久的蒋介石开始在台湾定居。

蒋介石的后半生要比前半生有声有色，前半生是与动荡、奋斗和失败连在一起的，后半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政治环境。在台湾地区的有限范围内，蒋介石全面移植南京政府的统治方式，在坚持军事反攻大陆、培养长子蒋经国接班的同时，注重改善国民党的形象，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持和强化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在蒋介石的最后日子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封锁两岸的大陆政策开始遭到严峻挑战。蒋介石正是在台湾社会和政治的大变革前夕，走完饱经沧桑、多姿多彩的一生。



蒋介石摄于东势神木前。

一、台湾“复兴”，强化一党专制

国民党当局退台后，在经历“二二八事件”的台湾地区，为维持和巩固统治，实施“戡乱戒严体制”，实行特务统治，严格监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活动，全岛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同时全面移植南京时期的政治体制，曾出任“总统”9个月、下台14个月的蒋介石于1950年3月“复职总统”“行政院”“立法院”“考试院”“司法院”“监察院”“五院”恢复行使职权，同时无限期地延长原为“任期制”的“三大中央民意代表”的任期。为维持和巩固统治，蒋介石对在大陆的失败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省，对国民党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造，为国民党维持在台湾地区的统治打下必要的政治基础。

（一）仓促撤退，台湾立足

在面临失败之际，蒋介石作出了“东撤台湾”的决定，把祖国的台湾地区作为国民党当局的新基地。在离开大陆之际，蒋介石最后一次回到家乡，向家乡的山山水水告别。同时，为应付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失败，蒋介石东奔西



1949年11月4日是蒋介石农历63岁生日。由蒋经国陪同，邀马超俊、李文范同游阿里山，在三代木前合影。

走，安排退台事宜。

台湾——国民党的新基地

在放眼无际、碧波荡漾的祖国东海上，有一座南北长东西窄的岛屿，这就是台湾岛。台湾本岛南北长有394公里，东西宽有144公里，周围有80余个岛屿环绕，总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为中国第一大岛。

把台湾这块土地从大陆推出140公里的是中更新世的地壳运动，把大陆与台湾原本相连的部分变成了90米深的海峡的是大海。地壳运动使得台湾和福建分开，但一水之隔的两地却是多么的相似：地形上，山脉和河流的走向及分布，平原和丘陵的安排，几乎是大自然按照同一设计图的复制品；气候上，同受亚热带海洋季风的控制，年温度变化、降水量、冬夏季风的光临，又是多么的相仿；植被上，黄、红棕土，冲积土，灰化土及盐土等土壤，海岸林群、热带雨林群、暖冷温带山地针叶树林群、亚高山针叶树林群等植物，水稻、茶和果品等农作物，如此的相同和一致并非人类的创造力所能及。

虽然大自然的力量，把台湾从福建外移了140公里，但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的成员却没有被这海洋鸿沟所阻隔。

1969年1月4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和地质系的专家们在台东县长滨乡海岸山脉东侧的三处海蚀洞穴中，挖掘出粗、细石器3000多件，骨角器114件。这批类同于福建清流、漳州一带旧石器时期文物的珍贵的石、骨器，将闽台两地的古人类与文化关系追溯到旧石器时期。

台湾新石器文化更清楚地把中原和台湾在文化上的同质性表现出来。台湾新石器中期文化代表台北圆山遗址和分布整个西部地区的后期文化代表黑陶文化，皆起源于山东龙山、浙江良渚、福建良平文化层，它们的基本类型和制作技巧是相同的。在台湾大小不一的上千处古人类文化遗址中，可以看出两岸源于共同的传统文化，同供一个佛、同信一种教、同拜一个庙，则更不用说。同一文化的力量将台湾和大陆连在一起。

中国人发明的纸，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化的传播，当然也记下了中华儿女共同开拓台湾、建设台湾的辛勤和努力。

战国初期的《禹贡》一书中，就有了台湾岛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称呼“岛夷”。

1700多年以前，吴国人沈莹在他的《临海水土志》一书中，称这片海上的土地是“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这是世界上第一次记载台湾风情的文字。

在此前后，吴国君主孙权也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水军1万到达被他们称为“夷洲”的台湾，这也是历史上有书为证的中国王朝第一次与台湾的联系。

自唐代起，福建泉州、漳州地区的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流向台澎，这是大陆民间形成的第一次向台湾的移民潮。明代末叶到清代中期，大陆往台湾的移民进入高潮。后来主政台湾的李登辉的祖先就是在此后期从福建永定迁居台湾桃园龙潭的。中原移民的进岛，带来了中原的文化、技术以及勤劳、勇敢的品质，他们与当地民众一起，共同建设宝岛。

南宋时，澎湖被列入福建晋江县版图，这在台湾开发史上是第一次。

公元1335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立“巡检司”，这一机构的编制有限、级别不高，但这是中央政府派驻台澎地区的第一个行政执法机构。

15世纪后，为打击不断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明朝政府在基隆、淡水二港派驻军队，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在岛内驻扎军队，保卫海防。

在万历年间，明朝的公文上正式使用“台湾”这一名称。

高雄凤山有特产“三宝姜”，就是明代郑和下西洋到达台湾时留下的，郑和舰队是中原到达台湾的第一支大规模的商队。

在“巡检司”设立550年之后，1885年五月初五，清朝光绪皇帝发布诏书，同意钦差大臣左宗棠和刑部左侍郎袁保恒的奏请，第一次在不久前胜利阻止英军上岸的台湾地区设省，从此台湾成为中国的行省，刘铭传成为第一位台湾巡抚。同时，与大陆洋务运动同步，台湾地区开始兴办各种实业，开矿、电报、铁路、造船、学校出现在古老的土地上。1891年10月，当清廷皇族为铁路是否坏风水、冲祖脉争论不休时，中国第一条铁路在台北至基隆运行。

大海向我们诉说的这些“第一”，不仅仅是时间先后的意义，而且包含着多少开拓者的艰辛，先行者的勇气，远行人的牺牲；包含着多少台湾对中原腹地的向往，多少中原人民对台胞的关怀。同样也告诉我们，正是在这种延绵千年的交往中，中华文化浸透了台湾；台湾人民则在连续持久的中华文化的陶冶下，成为这一令世界感到惊奇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文化的创造群体之一。

大海可以证明，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劳动、开发台湾的必然结果。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白皮书《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中所说，跨过海峡赴台湾的大陆开拓者“带去先进的生产方式，由南到北，由西到东，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大大加速了台湾整体开发的进程。这一史实说明，台湾和中国其他省区一样，同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开拓所定居”，“台湾的开拓发展史，凝聚了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智慧”。

历史发展到近代，外国列强也踏上了中国的领土台湾。

在有据可查的文字史料中，在包括台湾人在内的中国人开始开发、建设、管理、保卫台湾1370多年后，台湾地区才来了不怀好意的外国人。

冒着黑烟的蒸汽机成为西方工业革命的动力，强大起来的西方列强纷纷冲出国界，走向对他们来说陌生的国度。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贪婪和扩张成性的西方人第一次到达亚非拉许多地区时，只有一个词可以描述，那就是“侵略”。台湾所经历的遭遇也是如此。

中国历史上对台湾的称呼有近十个，如《禹贡》中的“岛夷”，汉代的“东”、“东鳀”，三国时代的“夷洲”，隋代的“琉求”，明代万历年间在朝廷公文出现“台湾”。无论以上名称有何意义，都无关紧要，因为名从主人，中国人为自己的土地起名无可非议。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爱称台湾为“福摩萨”。

最先听到“福摩萨”的是大海。1590年，正在热心于向外扩张的葡萄牙人乘船经过台湾海峡时，望着景色秀丽的宝岛，情不自禁地叫起“*Iiha Formosa*”（福摩萨）。此名为后来西方侵略者所沿用。从意为“美丽之岛”的“福摩萨”这唯一的外国人所起的名称中，可以看出西方殖民者对台湾的野心。在过了几百年，“台独势力”开始嚣张起来后，也把“福摩萨”的称呼作为“珍宝”。

1624年7月至1662年2月，荷兰人占领台湾38年。

在以后的岁月里，西班牙、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武装商队及军队又数次侵扰台湾。

1895年2月，中国北洋水师在威海卫被歼，至此中国在日本挑起的甲午

楼签署的《马关条约》，规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从此占领台湾达50年之久。

外国列强的侵略活动，并不能改变台湾为中国领土的属性。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收回了台湾，台湾回到了祖国怀抱。

在与中共进行最后的决战前夕，南京当局预感到失败为时不远，如何选择一个既能避免被中共彻底消灭，又能维持统治的新基地，已成为最迫切的问题。

在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曾就撤往何方进行过一场争论：

一部分人主张以抗战为例，撤往大西北和大西南，利用西高东低的地理优势，取居高临下防守之势，负隅顽抗。这样虽说防备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的难度较大，却有偷袭中原、东南之便。在实战中屡战不胜但对军事理论颇有研究的蒋介石没有采纳西撤方案，因为对失败不止的国民党军队来说，首要之举是如何躲避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否则国民党的部队及政权将全部覆灭，而撤到西南西北是逃脱不了当时最善于进行地面作战的解放军的追击的。

一部分人主张东撤台湾，认为台湾海峡对当时没有海空军的中共来说，无疑是一条不易克服的天堑，对有条件渡过海峡的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来说，将会有效地躲避致命打击。

以历史地理学者张其昀为首的蒋介石幕僚们对此一方案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他们认为把台湾作为“‘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大陆任何地区都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台湾的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存，全岛农作物和植物资源丰富，土地利用率高，生产能力和粮食产量基本可满足为数在200万左右的去台人员的需要；台岛有海峡之险，军事上便于防守，并位于太平洋西缘，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取与美国远东防线南、北呼应之势，只要固守台湾，美国不会坐视不救；台岛内部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本殖民者留下的基础，经济有发展的便利；因为孤悬外海，与大陆隔开，政治上便于控制，可以有效防止所谓的“共谍”破坏。

此外，张其昀利用自己的地理专业理论，还把国民党去台最佳航海路线和航海图描绘完毕，后来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撤退台湾时，就是用的这张航海图。以后国民党当局收缩兵力，舟山、大陈岛等地的国民党军队撤回台湾，也是走的这条路线。



国民党逃台时带走了大量北京故宫的珍贵文物。这是蒋介石、宋美龄在台湾参观这些稀世珍宝。

蒋介石同意东撤方案后，从1948年底起，就开始了经营台湾的工作。

第一，挑选强人主管台湾。蒋介石决定由新的权力班子主管台湾，有以下考虑：台湾将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统治中心以及唯一可能生存的省分，其重要性不待而言；安排整个国民党政权撤往

台湾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并非一般官僚所能胜任；在大失败的过程中，意想不到的事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完全有必要派出“政治强人”出任。基于上述考虑，蒋介石于1948年12月任命陈诚接替魏道明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诚追随蒋介石已20余年，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数不胜数，更为重要的是陈诚自抗战起就作为蒋介石的“钦差大臣”，时常担当救急、压阵和督战重任。蒋经国为蒋介石的长子，“太子”身份足以压住任何级别的官员和实力派的捣乱。蒋介石的选择符合国民党官场的现况，陈诚和蒋经国确实实现了蒋介石的意图。两人上任后实施“铁腕统治”，使得已经混乱不堪的撤台局面得以控制，并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整顿打下必要的基础。以陈诚、蒋经国为首的“实力派”成为后来40年间台湾政治的主要掌控者。

第二，抢运各种战略物资。蒋介石比任何人都清楚去台初期面临的物资奇缺的处境，为便于在台湾的生存和恢复，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往台湾抢运各类军事装备、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此次抢运，国民党方面到底从大陆搬走了多少物资，难于计数。民间一些对中共不了解、不信任的工商界人士和富豪把多少财富带往台湾，也难于计数。其中，仅由蒋经国过问，在上海解放前夕抢运走的中央银行金库的库存就有黄金90吨左右、银洋1500万元、美元1.5亿元。在抢运物资风潮中，仅在上海战役期间，在蒋经国、汤恩伯和谷正纲等人安排下，从上海地区就运走了1500多船各类物资，有工业设备、技术资料、生产资料，

有布匹、棉纱、纸张和粮食等各种各样的日用品。从大陆抢运走的物资，成为国民党去台初期得以生存的主要物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南京政府当局组织人力、物力，从北平故宫博物院内运走40万箱珍贵文物，均为从文物宝库故宫中挑了又挑的稀世珍宝。这些曾经被运往抗战大后方的无价之宝在全面内战开始后，直接运往台湾，这成了以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核心珍藏和展览品。

第三，充实台湾防卫力量。在全面内战走向全面失利之时，南京政府就开始把台湾作为训练后备兵员的基地，并调派孙立人主持这一事务。在决定把台湾作为“复兴基地”时，由蒋介石、陈诚亲自安排台湾兵力的调整部署，先后把当时周至柔主管的空军、桂永清主管的海军、蒋纬国主管的装甲兵和各特种兵部调往台湾，在战败过程中，又将刘安祺指挥的青岛守军、刘玉章的第52军、刘汝明的第8兵团、李良荣的第21兵团、胡琏的第12兵团残部、陈济棠和薛岳的海南守军残部，以及后来逃往越南的黄杰的第1兵团运到台湾。在上海战役中败北后撤到舟山群岛的陈大庆、石觉部也被调运到台湾，加强台岛的防卫。台湾地区成为国民党军事史上部署兵力最密集的省区之一。

第四，严格控制去台人员。从三大战役结束、蒋介石第三次下野起，陈诚和蒋经国就开始实施台湾的出入境管理。1949年3月1日，台湾省政府公布“台湾省入境军公教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开始办理“入境证”；5月20日，陈诚以台湾省主席、“警备总司令”名义，发布“戒严令”，“戒严”期间，除基隆、高雄、马公三港在“警备司令部”的监护下继续对大陆来台人员开放外，其余各港口一律封闭，禁止出入。控制去台人员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不利于国民党在台湾统治和社会稳定的人员不能去，这样一大批被国民党认为在政治上不能与其保持一致的人员被排除在岛外；二是不愿意去台湾但又关系到国民党政权形象和生存的人必须去，其中有同情民主和爱国、不愿意离开大陆的一些元老重臣和“中央民意代表”，有科技界精英、各类专门人才、工商实业界人士。在去台湾的人中间，许多国民党元老到台后不久即被当局冷落，科技人才、工商人士则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人力和科技资源。

溪口——蒋介石的故乡

蒋介石自第三次下野回家乡到1949年4月25日离开，在旧宅住了3个月又 1397



蒋介石在与故乡亲友话家常。

4天，此次是他自参加辛亥革命后在故居丰镐房住得时间最长的一次。以前两次下野及在政务之余，虽说经常回溪口，可住的时间均不长。第三次下野后也可以不住家乡，可以前往上海、杭州、台北定居、游历，但他比谁都清楚，此次回家已是最后一次，实际上是活着向家乡

告别，不能再错过机会。只有趁解放军大举渡江之前，带着蒋经国和蒋纬国全家（此时宋美龄在美国活动），按照传统方式和习惯，与乡邻和亲友们一起，在溪口镇过上一段具有浓郁乡情的“民间生活”，再次游览家乡山水。正如蒋经国在日记中所说：“此次下野，得返溪口故乡，重享家园天伦之乐，足为平生快事；而在战尘弥漫之中，更觉难得。”“回到家乡奉化溪口，突然又体味到十分温暖的乡情；而且尽量享受了天伦的乐趣。”蒋经国总结道：“盖，父亲一生最喜过平淡的生活也。”（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51页）

蒋介石一进家门，即举行仪式祭告祖先，大摆宴席，溪口当地名人和蒋家宗族的人都被请到场。席间的气氛沉闷，各有所思。蒋介石则很明智，没有大谈国家大事，只是谈了一些家乡建设小事。他说应该在溪口开办一些小型加工工业和纺织业，利用溪水发电，把溪口建成以农业为主，也有小型工业的示范农村集镇。这话已经晚矣，当初南京政府没有失败时，蒋介石在家乡没有做这些应该做、惠及父老乡亲的事，现在已没有做的可能了。不过，蒋介石想做没有做的事，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做到了。他的家乡如今已经发展起来，昔日农村小镇已经成为现代化的闻名中外的旅游热点，溪口地区的经济文化状况也有了很大改观。

给家乡人印象最深的，是蒋介石庆贺1949年除夕和新年的到来。临到除夕，由武岭中学校长施季言出面，到南京请来一个京剧班，在溪口演出一个多月，蒋介石看过几次。他是一名京剧爱好者，可这是他最后一次看京剧，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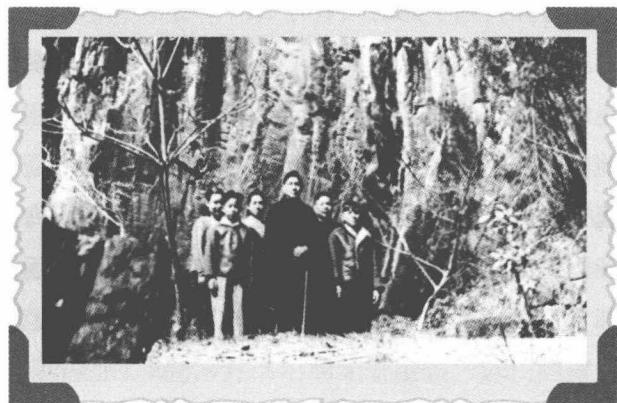
他就发誓要看京剧就要在南京、上海看，也就是说不收回大陆就不再看京剧的演出。蒋经国对京剧说不上有什么特殊的爱好，而蒋方良则是更多地从新奇的角度去欣赏京剧了。

丰镐房还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年夜饭，从南京赶来贺新年的有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常委郑彦棻，地方各级父母官，蒋家宗族成员，镇一级的名人，王采玉、毛福梅娘家人及蒋家各姻亲、友人，统统到场，真成了名副其实的辞旧迎新，既是送旧岁，也是蒋介石在家乡的告别宴会。那

天，蒋介石坐在正厅首席，奉化县县长周灵钧则是最高的父母官，应邀相陪。武岭中学校长施季言和警卫组主任石祖德，分坐两旁。蒋经国夫妇在下首执壶敬酒。席间，蒋介石还是大谈建设家乡，要在溪口建一座大桥，这样汽车可以直通法华庵。表面上看，他颇有大将风度，似乎外面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可谁都知道他在想什么：辽沈、平津、徐蚌三大会战后，军事力量的对比如何？中共下一步军事动作是什么？最担心的是，李宗仁正在筹划的与中共谈判的进展如何？如何利用江南半壁江山和中共继续对抗？……每个问题都令蒋家父子担忧。正如蒋经国在日记中所说：“农历元旦，黎明即起，在溪岸四望山景。念一年又过，来年如何，实难想象，更不知多少人在痛苦和忧愁中，度此年



蒋介石带着儿孙最后一次在故乡与族中长辈合影。



蒋介石带领儿孙最后一次在徐凭岩瀑布前留影。

节。目前整个社会，充满了血和泪，我纵欲新年言吉语，但事实如此，又如之何！”（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152页）

蒋介石去了当地所有略有名气和对蒋家有意义的地方。每到一地，他总是大谈发展计划，而心头却别有一番滋味，正如当时在场的人所说，他待着不动，好像在记忆儿时到这些地方的光景，又好像在寻觅着什么，依依不舍。那种唯恐遗漏了什么、那种难舍难分的离情别意，深深地揪住了他的心。直到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他还不愿离去，像在等待什么奇迹出现。

永远离开家乡，对无论何人都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蒋介石作为一国之领袖，最后政权被人民推翻不说，连家乡都无法容身，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然而这毕竟是属于感情方面的事情，蒋介石也不全是为了寄托家乡情才回家的，他躲在家乡，所干的主要事情是破坏“国共和谈”和挤兑李宗仁。在此同时，蒋介石亲手抓的大事有二：

一是1月10日要蒋经国到上海，指示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金库中还未运走的黄金、白银和外汇全部转移台湾。在蒋经国的直接过问下，到上海解放前，一共运走四批，上海会战期间又抢运出最后一批。其中最后一批是在上海战役已经开始后的第三天进行抢运的，当时上海外围战场已经白热化，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十分关心这最后一批储备金银的命运，下令由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亲自负责此事。陈大庆派出一个警备连，于午夜赶到中央银行金库，用6辆军用

卡车3个来回运走全部黄金和银圆，然后一同登上登陆舰，直运基隆。这一巨额资金，成为国民党在台湾生存、“复兴”的第一笔基金。论“功”行赏，后来俞鸿钧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地位直线上升，最后官至“行政院长”。

二是处理陈仪劝降汤恩伯一事。陈、汤关系之亲密为国民党上层所共知，没有陈仪在当年推荐、担保汤恩伯就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只有一位姓汤的小学体育教师而没有后来的汤总司令。陈仪是在北伐过程中联络上蒋介石，以后和蒋介石的关系较好，



因为他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所以在日本士官系势力较大的国民党军界，陈仪还有不少知音和校友。提议国共和谈后，身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不愿看到长三角沪宁杭富庶之地、工业基础、文化遗产、秀丽风光毁于兵火，通过友人、中共地下党员胡邦宪和反蒋民主人士陈铭枢等人，与中共取得联系。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持下，陈仪派出外甥丁名楠和胡邦宪分别于1949年1月31日和2月7日，前往上海会见汤恩伯，劝汤率部起义。10日又让丁名楠去沪向汤面交亲笔信，信中提出“起义五要件、起义准备八要领”。汤恩伯对前两次是敷衍了事，引陈上钩。待拿到陈仪的亲笔信后，证据在握，立即派上海警察局长毛森赶到溪口向蒋介石告密。蒋介石考虑到陈仪是汤恩伯的干爹和恩人，所以把汤用专机接到溪口。汤恩伯此时更关心蒋介石对自己的态度，他为了划清同陈仪的界线，不惜出卖恩师，蒋介石对此十分赏识，征求汤如何处置陈仪的意见，汤毫不犹豫地表示：“国家大事，义不徇私，自应以领袖之意见为意见。”为催蒋介石立即处置陈仪，汤还主动向蒋推荐周岩接任浙江省主席，一副落井下石的无耻嘴脸。陈仪的遭遇可想而知，因为他的职务太高，又在战争紧要关头，为防不测，陈仪问题由蒋经国直接掌控。在蒋经国的亲自督促和主持下，陈仪被撤职、关押，后押往台湾，1950年6月18日被害。

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由于蒋介石的拒和立场，在1949年4月20日《国内和平协定》签字的最后期限到来之日宣告破裂，人民解放军第2、3、4野战军先后渡过长江，到24日解放南京时，解放军渡江各部已进入纵深追击阶段。“闲居”溪口镇的蒋介石再也待不下去，沿宁沪铁路、公路和宁杭公路滚滚而来的解放军铁流正在向浙东靠近，驻扎奉化的原青年军208师改编的第87军已经紧张万分。蒋介石匆匆忙忙把儿媳和第三代孩子送往台北。根据蒋经国自己的记录，蒋介石在家乡最后的日子是这样的：

“中午，奉父亲嘱咐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



出卖恩师的汤恩伯

我当即请示此行的目的地点，父亲没有回答。当时只好准备一艘军舰，听候命令。舰名‘太康’，舰长黎玉玺中校问我：‘你知道不知道，领袖明天准备到什么地方去？’

我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道水路看来，目的不外乎两个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厦门。’黎舰长甚以为然。

.....

昨日（4月24日）妻儿走了，傍晚到丰镐房家中探望，冷落非常，触景伤怀。

（4月25日）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无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

下午3时，拜别祖堂，离开故里，乘车至方门附近海边，再步行象山口岸登舰，何时重返家园，殊难逆料矣。

发舰后，父亲才说出要去的地方：

‘到上海去！’

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盖共军已经渡过长江，上海情势非常危急，此时到上海去，简直是重大冒险。但是父亲对于这些，毫不在意，因为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责任，就顾不得自身的安全，而定要在最危险的时机，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了！父亲一生冒险犯难，又岂独此而已。”（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194至第196页）

离开家乡前10天，是蒋经国的生日，蒋介石题了“寓理帅气”和“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五年来，未尝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颇悟。又常玩索存心养性之‘性’字，自得四句曰：‘无声无臭，惟虚惟微，至善至中，寓理帅气。’为之自箴；而以‘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未敢示人。今以经儿四十生辰，等书此‘寓理帅气’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的《跋》，以示祝贺。这是蒋经国在大陆时期的最后一个生日，祝寿低调且沉闷；也是蒋介石在大陆故乡最后一个家庭节日，从此以后

所有的家庭节日都在异地他乡进行。

是啊，蒋家父子可以把黄金美钞搬走，可以把军队和官员搬走，可以把各种物资搬走，可以进行现代史上少有的大搬家，但是家乡的山山水水搬不走，家乡情无法改变。蒋介石要永远离开故土，心

情之坏可想而知！他怎能忘记家乡的山水草木？怎样向列祖列宗交代？作为蒋家传人，再也不能给祖先上一炷香、点一炷蜡，曾鼎盛几十年的蒋家祠堂再也不见了后辈的香火，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章孝严、章孝慈等后辈回到家乡时才有了改变。

4月25日下午2时，蒋介石一行来到象山附近的头江口，因为水浅，无法靠近前来接应的汽艇，只好先上竹排。蒋介石坐在竹排的椅子上，在蒋经国、俞济时的陪同下，前往近一里路外接应的汽艇。再由汽艇送往早就停在头江口外的清江中的“太康号”军舰，出狮子口就是大海了。当时，护送蒋介石上竹排的都是当地的保甲长们，完成任务后都领到了一块银圆，只是他们都不敢要，把钱全退给了保长。（蒋介石告别家乡情况参见《蒋介石家世》第22至第37页、第213至第220页）

4月26日下午1时，“太康号”军舰到达上海黄埔江中的复兴岛，蒋介石此次到上海的目的，一是亲临前线，亲自领教一下解放军的攻势。这是他3年内战以来第一次到达真正的军事前线，参加守城之战，按蒋经国和国民党的舆论所说，则是为了“保卫大上海”。二是督促抢运各种物资，包括抢运最后一批储备黄金。三是安排撤走有生力量。

第一类事，由蒋介石出面，先后召见国防部长徐永昌、总参谋长顾祝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保密局长毛人凤、参谋次长郭寄峤、上海市政务主任谷正纲、市长陈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防卫司令石觉、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等人，商量防卫上海事宜。蒋介石的军事指挥艺



蒋介石率领儿孙最后一次在父亲墓前行礼。